

## 路遙不覺遠——我的詩學之路

蔡瑜\*



中學時期的我就以中國文學系為第一志願，進入臺大以後更確定以詩學為目標。這個想頭在初始或許只是一個朦朧的浪漫夢想，只因為對詩特別有感，深信若能從「性之所好」出發，在取之不盡的古典精華中自由翱翔，應該是無比幸福的。中國詩學從作品到理論浩瀚如海，當興趣成為志業，就必須有深耕廣拓的打算。我的研究約可分為三個階段，從碩博士論文到教授升等論文，皆以「唐詩學」為標的，研究的時間軸以明代為起點，上溯至宋元，最後來到唐代自身的詩學。唐詩是中國文學批評最重要的試金石，無數的文學理論由此生發，通過貫時性的系列研究，「唐詩學」幫助我建構了一個具體而微的中國詩學地圖，訓練我嫻熟於既有的詩學研究途徑，給我一種按部就班的扎實之感。不

---

\*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

過，這一階段也留下不少待解的困惑，潛藏了依循傳統研究方法難以突破的瓶頸。

在期待轉折契機的同時，我開啟了第二階段的研究，將焦點放在有關「自然」的詩學。這項研究的展開，仍然多少存有「任性」的成分，想要印證自身「性好山水」的體驗。那種發生在我身體中的感知與領悟，正以我的身體為中介，勾連起古往與今來，我該如何通過詩歌研究將之表述出來？這個議題足夠宏闊，即或我出自私願，也不至於窄化了中國詩學。相反地，「自然」無疑是當今世界的顯題，各個學科都以不同的角度切入討論，在現當代研究「自然」不可能沒有潛在的參照體系，跨越學科藩籬的思考成為必由之路。我的自然詩學奠基在「六朝」這個獨特的時代，此時詩學、思想、畫論，在「自然」這一議題上共振交響，詩人同時可以是哲人，「自然」是生命至高的境界，同時也是實踐此一境界的場所。真正貼近這個時代的詮釋是使文史哲重新合流，掌握「自然」的多元投射及其多義性。在如此的視野下舊議題勢必展現新風貌，我將主軸放在田園、山水、風景詩的根源性理論，以身體與場所的交互詮釋，完成陶淵明、謝靈運、謝朓的重新定位及系列探究。

六朝自然詩學的脈絡極為複雜，其中涉及的許多文學主題皆可對應到時代的思想議題，順此脈絡可以向前向後輻射擴散到不同時代，建構詩與思交響的譜系，以完成更為全面的中國自然詩學。只是，當我們想要說清楚六朝詩與唐宋詩在自然表現上的根本差異時，除了思想形態之外，體式變革的因素無疑躍居首位。漢語漢字的特性及其形構詩歌體式的原理有必要從根源處追究，這一問題意識促使我的研究邁向第三個階段，亟需匯通語言學以研析其與詩學的深度關涉。我於是順著六朝詩學的脈絡重新定位南齊「永明體」為中國第一次詩界革命，此一變革立基於梵漢交流所帶來的深刻語文自覺，在「聲」的方面，永明詩人從梵漢對照建立聲韻分解的審音原理，從轉讀佛經與梵吟詠體察語言自身的音樂性；進而由音韻的可分解性，領悟詩歌聲律的可調節性。由於學科性質及聚焦不同，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很難直接回答詩學的問題，而須經過脈絡的重新梳理，過程極為艱辛，但也因此充滿發現的樂趣而能有所突破。此項研究成果彌縫了六朝文學批評史的諸多斷層，將文學批評鉅著《文心雕龍》、《詩品》與永明詩學連屬為一場接續發生的文學自覺運動；也為入唐以後蓬勃興盛的詩歌體式革新，找到發展源頭與堅實的理論基礎。

當六朝詩學向下貫通到唐詩學時，我的前後研究因而連成一氣，十多年前的研究困境也展露曙光。當年因為研析唐人《詩格》，對傳統格律研究的框架產生了許多疑問，此時這些疑問以更強烈的方式向我叩問。過去以人工標記詩歌

音韻再進行統計分析的步驟極為繁瑣，致使詩歌的格律研究長期處於滯後的狀況，以致無法正視唐人《詩格》與清人《詩話》間的格律規範，實存在巨大落差。對此問題的質疑，我在《唐詩學探索》中已有理論的提示，終因不能取得鉅量的實證數據而不得不擱置。十多年來這個問題始終縈繞心頭，不曾或忘，而今終於在新的時代尋獲解決的契機。便積極和語言學及資訊學者籌組團隊，共同研發「漢詩格律分析系統」，將數位工具導入詩學研究，為詩歌的音韻分析及體式研究提供高效能的研究工具。這項努力無意將詩學導向量化研究，而恰恰是要將之從繁瑣的統計流程中解放出來。當數據驗證不再成為負擔，研究者可以有更多的大膽假設與小心求證的探險，將焦點放在現象分析與理論思辨，從而深化甚至創新議題。未來的三年，我希望能夠完成一部漢詩格律發展史的專著，為詩歌的韻律美學提供最基源的研究依據。

這一段漫長的詩學之路，始終有著科技部的計畫支持，起初我只懂得單打獨鬥，提出一個個單篇論文的寫作計畫。但這個情形在參與整合型計畫「重探中國人文傳統的自然觀」及「身體與自然——一個跨文化的論述」時有了突破；一方面得以從跨學科跨文化的視野來審視自己的研究主題，一方面促使自己以更長遠的時程規劃自身的研究。在此期間我也獲得科技部的補助前往日本京都大學研究，見證了多學科共同聚焦於身體、自然議題的豐碩成果；深體以漢字文化圈定位中國文化研究的重要性。這些歷練對於開拓傳統中文研究的視野有莫大的助益。爾後，為了突破研究工具的限制，而主持數位人文計畫，合作的伙伴更跨越了人文與科學的界線，其間的溝通協調充滿挑戰，也處處驚喜。既是跨學科的合作，其影響就不會是單方面的，而具有相互性。能夠彼此開放視域、相互尊重學習，跨學科的合作才有機會開拓出嶄新的思維方向，引領研究者調整解決問題的方案，其收穫往往始料未及。

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勝場，即或是從事古典研究也應與當代互通脈息，將掘發出的古典精義透過創造性的轉化，連結現代社會的知識結構，以新的形式反饋給當代文化。而具有原創意義的研究總是從自我的蛻變開始，只要堅持的力道足夠，問題就會自尋出路，指引我們該如何充實自我、尋求合作，以跨越局限、突破困境。對我而言，從思想、語言到數位科技，每一次的激盪都是一個化學質變的過程，重構了我對世界的認知及感覺結構，由此開拓觀照詩學的視野，向追索更深邃的人文意蘊繼續邁進。人文學首重溝通與傾聽，獲獎的肯定，正是深層的同理心與共感力的實現，讓人由衷地感激。